



• 12 • 資料匯編 •

外國論文卷





· 12 · · 资 料 汇 编 ·

外 国 论 文 卷

主 编 陈书仪 路英勇

顾 问

(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玉哲 石洪印 任继愈 刘蔚华 安作璋 时立军
庞 朴 杨向奎 赵志浩 赵蔚芝 徐北文 郭化若
袁世硕 董治安 蒋维崧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划排列)

主任：李新泰 钱海骅

常务副主任：李金海

副主任：王志民 冯梦令 关玛莉 孙言诚 孙树木 陈学振
张光兴 郭焕芳

委员：王志民 王德敏 冯梦令 关玛莉 孙开泰 孙言诚
孙树木 陈书仪 陈学振 李金海 李新泰 张光兴
郑杰文 宣兆琦 钱海骅 郭焕芳

编辑部

(按姓氏笔划排列)

主任：王志民

常务副主任：宣兆琦

编辑：于孔宝 王光坊 王志民 邱文山 宣兆琦

责任编辑：侯仰军

封面设计：王悦玉

版式设计：徐方中 张 薇

外国论文卷

陈书仪 主编
路英勇

目 录

齐文化研究在国外 (代前言)	陈书仪 (5)
齐学的起源及其沿革	〔日〕 岛田钩一 (19)
道家思想的原始形态	〔日〕 赤冢 忠 (33)
楚齐晋中央政府的组织结构比较	
.....	〔美〕 莫尔文·P·赛彻 (56)
如何读《六韬》	〔美〕 苏德恺 (70)
《管子》“心术”四篇探源	〔美〕 李克 (76)
《管子》四篇中的养生说	〔日〕 鬼丸 纪 (93)
反映世界古代经济思想的文献	〔前苏联〕 史太因 (110)
管仲的经济思想	〔日〕 冈田 巧 (132)
关于《管子》“轻重”诸篇	〔日〕 木村英一 (152)
《管子·问》篇试论 (第一部分)	〔日〕 宇都宫清吉 (165)
孙武——中国行为学、斗争哲学和科学的创始人	
.....	〔意大利〕 克里斯托夫·高利科夫斯基 (179)
孙子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马来西亚〕 郑良树 (194)
米太亚德和孙子：兵法与马拉松战役的大师	
.....	〔希腊〕 D·斯摩科维蒂斯 (212)

《战争论》和《孙子兵法》的战略概念

.....〔加拿大〕洛尔·帕凯特 (220)

齐国田氏与春秋末期邑制国家体制的崩溃

.....〔日〕太田幸男 (231)

论田骈的思想.....〔日〕向井哲夫 (253)

汤普森《〈慎子〉佚文》简介.....索介然 译介 (274)

自然哲学家邹衍.....〔日〕金谷 治 (287)

邹衍学说：一种政治思想.....〔日〕浅野裕一 (302)

方士考.....〔日〕鎌田重雄 (322)

《淮南子·兵略训》的文化渊源.....〔日〕谷中信一 (328)

经今古文分立的源流.....〔日〕内野雄一郎 (345)

后记..... (360)

齐文化研究在国外

(代前言)

陈 书 仪

“齐文化”这个概念的名称，在中国，只不过是近十几年才叫起来；在外国，对先秦齐国的一些文化现象，至今还没有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其进行系统的探讨。但是，对先秦齐国的文化典籍、圣哲先贤及其思想的研究，起始时间并不晚，而且也不乏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要概括一下世界各国对整个齐文化研究的情况，目前尚有困难，这里，我想只选择在国外影响较大的齐文化的两部代表性著作——《管子》和《孙子兵法》的研究，作一粗线条的概述。

《管子》，在我国是一部少见的综合性巨帙。它的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是研究齐文化以至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所以，它不仅为我国历代学者所注目，而且也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学者所重视。

西方人对《管子》的评介和翻译是从 19 世纪末开始的。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可称为介绍阶段。在这个阶段，虽有些论文，但多

是介绍性叙述，还称不上研究。这个阶段，在德国，甘贝伦茨（Gabelentz）著的《管子哲学著作》和《管子批判初备》先后于1886年和1892年发表（分别见1886年《日本研究学会论文》第五集和《柏林普鲁士王国科学院会议报告》，1892年2月18日全体会议）。1896年亨利·考笛埃（Henri Cordier）在《中国典籍》第十集上发表了《论管子变动的影响——马吉奥依谈中国》；1902年威尔汉姆·格鲁勃（Wilhelm Grube）在莱比锡C·E·郎格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献史》（此书为《东方各地文献》一书的第八卷）中介绍了《管子》一书。甘贝伦茨和格鲁勃介绍的重点是对原文进行单纯的叙述。

在法国，哈勒茨（Harlez）以《公元前七世纪中国的一位大臣齐国的管子与〈管子〉书》为题的论文在1896年第四期《亚洲杂志》上发表。哈勒茨试图翻译前十篇，但是，由于《管子》一书在我国已素称难读，对这些外国翻译者来讲，自然难度更大，许多段落被全部删掉，而且在内容上有许多误译。

在英国，爱德华·派克（Edwanrd Parker）教授先后发表了两篇关于管仲的文章，一是在1918年7月出版的《亚洲观察》上发表的《二千五百年前的普鲁士式文化》，二是在1921年出版的《新中国观察》上发表的《管子》。不过，这些文章也都属于介绍性文字。

20世纪20年代末，西方对《管子》的真正研究才开始，直到50年代，可以称为第二个阶段——研究阶段。1927年德国人福尔克（Forke）在其撰写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对管仲作了简要介绍，并翻译了《管子》的若干片断。这本书是西方关于中国哲学的权威性著作之一。

1927年，法国汉学家亨利·马斯波罗（Henri Maspero）出版

了他的《古代中国》。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一个很有影响的观点，那就是：如今的《管子》是伪作，刘向的序也是伪作。主要论据有三：（1）《管子·法禁》中引述了《尚书·泰誓》篇，而《泰誓》篇是公元前3世纪的伪作；（2）《管子·大匡》照抄了《左传》，甚至保留了鲁国的纪年；（3）根据张守节的《史记正义》，《管子》只有18篇。马斯波罗的这个观点，直到本世纪的60年代还支配着西方的《管子》研究领域，使西方的学者一直以怀疑的眼光看待《管子》。

尽管如此，不同意见的争鸣仍然存在。1929年，瑞士学者伯恩哈德·卡尔格伦（Bernhard Karlgren）在其《中国古代书籍的可信性》（见1929年第一期《远东古代博物馆公报》）一文中，对马斯波罗的两个观点进行了批驳。他认为：（1）《管子·法禁》与伪作的《尚书·泰誓》有不同之处，与《左传·昭公二十四年》的段落相仿。比较这三个段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泰誓》的伪作者在成文时，既借鉴了《管子》，也借鉴了《左传》，不能据此认为《管子》成书于《泰誓》之后。（2）《管子》照抄《左传》，那仅仅说明它在《左传》之后成书，不能得出伪书的结论。

1952年，剑桥大学的学者荷兰人皮特·梵·德龙（Piet Van deloon）在其《论〈管子〉的流传》（见英国1952年出版的《通报》第二卷第41期）中，对马斯波罗的第三个观点进行了认真的探讨。作者认为，张守节所提到的《七略》，实为《七录》的误读。《七录》是阮孝绪（479—536）提供的一个书目概要。张守节曾多次援引它，有时写作《七录》，有时写作《七略》；而且18“篇”显然是18“卷”的误解。“卷”是隋唐时期文献中对《管子》最常见的划分方法。作者对于《管子》的成书、流传和版本考证相当细致。

1942年由英国学者休斯(Hughes)翻译的《管子》之《水地》、《四时》，收录在名为《古典时代的中国哲学》一书中，这是一本广为流传的英译本中国哲学论文选。1956年《水地》的译文也在李约瑟(Joseph Needham)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二卷中收录(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个时期，一些学者进一步致力于对《管子》的翻译。其中有在剑桥大学任职的德国汉学家古斯塔夫·哈洛恩(Gustar Haloun)，他于1933年完成了第一篇《管子》译文《弟子职》，发表在同年的《大亚细亚》杂志上。1951年，他的《法家著作片断》第一部分：《〈管子〉五十五及有关原文》，发表在同年的《大亚细亚》杂志上，其中包括《九守》的译文。他提出了《管子》最初成书于公元前250年稷下学宫的假设。哈洛恩的其他一些译文未及发表他就去世了，其手稿至今仍保存在剑桥大学图书馆。

进入50年代，西方的《管子》研究进入第三阶段，即成果频出的阶段。

1954年出版的《古代中国的经济对话：〈管子〉选集》，是在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经济学教授路易斯·马弗里克(Lewi Maverrick)指导下，由中国大学毕业的谭伯甫、温公文翻译的。他们共翻译32篇，多为节译，而且多涉及政治和经济理论，本书还把中国学者的两篇研究文章的全文译成英文，附录在书后。这本书为西方学者研究《管子》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但是，由于译者似乎都不是学经济学的，再加上没能利用清代及其以后的较详细的注释资料，所以，译文中有不少讹脱。尽管如此，它还是西方《管子》研究的第一部专著。

在这一时期，研究《管子》最有成就的是美国的李克(W·Allyn Rickett)，他被西方学者誉为研究《管子》的权威。李克

1948年至1951年在中国燕京大学学习并工作，在许维通等著名学者的指导下开始研究《管子》。1960年发表了题为《中国古代的一幅明堂图：〈管子·幼官〉》的论文（见《通报》第48卷），1965年香港大学用英文出版了他的专著《〈管子〉——早期中国思想的宝库》，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管子》的《大匡》、《度地》等12篇的完整英译，并有较详细的注释与考证。1985年，李克的《管子》第一卷作为《普林斯顿亚洲翻译丛书》之一，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副题是“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哲学论文的研究与翻译”。这是李克40年艰苦努力的研究成果。这本书的宗旨是：不是给《管子》某种评价，而是试图通过准确的翻译，使西方读者掌握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第一手资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础。这本书里有许多考证，如考证了《管子》书的形成、《管子》与管仲的关系等。尽管有些观点很难为中国学者所接受，但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1987年，他的《〈管子〉与新近发现的竹简与帛书》一文，收入布兰克等主编的《中国关于自然与社会的观念》一书。李克研究《管子》雄心勃勃，为了集中精力，他于1987年辞去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职和政职，潜心《管子》的翻译与研究。近年来，他十余次来我国收集资料，我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及考古发现，都能及时地反映到他的文章中。他的《管子》一书计划出三卷，除已出版的第一卷外，还计划再出两卷。第一卷与第二卷是原文翻译，第三卷是他的研究论文集。

在这一阶段，欧美研究《管子》高质量的成果仍在不断涌现，较有成就的学者有美国的瓦特生（Watson）、罗森（Rosen）、罗伊（Roy）、莱格尔（Rregel）、包尔茨（Boltz），英国的撒切尔（Thaecher）、葛瑞海姆（Graham）等等。

在前苏联，研究《管子》是从本世纪 50 年代才开始的。1959 年，汉学家史太因（В·М·ШТЕЙН）在莫斯科出版了《〈管子〉的研究和翻译》一书，其中翻译部分包括 18 篇《管子》文章，主要是有关经济的篇章；研究部分是一篇导论，在这篇长文中，作者提出的许多见解很有参考价值。

比较起来，国外研究《管子》以日本为最盛，也有较突出的成就。从 17 世纪后半期起，就有学者不断注释《管子》，其中 1789 年猪饲彦博出版的《〈管子〉补正》两卷、1864 年安井衡出版的《〈管子〉纂诂》二十四卷和 1870 年出版的《〈管子纂诂〉补正》最为世人注目，这些书参考诸本，旁稽群书，附以己见，纠正讹脱，多为中日学者所征引。《管子》的日译本自 1922 年起亦相继在日本出版，就现在所知，有小柳司气太等译的三种。本世纪 30 至 50 年代，散见在日本报刊上的专题研究论文数量不少，高质量的也不鲜见。如小林升的《管仲观的变迁》（《历史学研究》，1935 年第 4 卷第 6 期），《对〈管子〉的一个看法》（《东洋思想研究》，1938 年第 2 期），穗积文雄的《〈管子〉的经济思想》（1941 年《经济论丛》第 52 卷 4 号），木村英一的《关于〈管子〉成书的几个看法》（1942 年《支那学》卷 10 特号），长部和雄的《〈管子·轻重〉篇论》（《商大论集》，1950 年 3 月），町田三郎的《〈管子·幼官〉篇考》（《集刊·东洋学》，1959 年 1 月）等。60 年代以来，论文更日趋多见，町田三郎、赤冢忠、原崇子、小野泽精一、金谷治、柴田清继、久保田刚等人都有不少高质量论文发表。1987 年金谷治先生的研究专著《〈管子〉研究》在日本岩波书店出版，全书分八章，就《管子》与管仲的关系，《管子》的版本，《管子》的政治、经济、军事、哲学、法、时令等思想以及《管子》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等作了全面系统的探

讨。谷中信一先生于1989年在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出版了《日本——中国：管子研究论文、文献总目索引》，全书搜集了中日从古至1989年9月发表或出版的《管子》版本、研究论文和专著目录。全书分六节：版本、序跋、考伪、专著、论文和未见一览；每节均把日本与中国分列，每一项都罗列七方面内容：著作题目和卷数、著者姓名、出版单位或所载报刊、出版或发表时间、内容构成、摘要、备考。本书搜集之全，令中日学者瞠目，为研究者提供了一本很好的查找资料的工具书。1989年至1992年，远藤哲夫先生在明治书院出版的三卷本《管子》问世，这是日本第一部全译本，对《管子》现存的76篇，逐篇翻译，内容分为题解、中文原文、日文译文、校勘、通释、注解和分析等七部分。该书广泛吸收中日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日本学者进一步研究《管子》提供了一部最权威的译本。金谷、谷中、远藤三位先生的著作，集中在本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出版，这不是偶然的，它标志着日本研究《管子》已经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几年中，三位先生还在中日报刊上连续发表了许多研究齐文化的论文。金谷治与谷中信一多次来中国参加齐文化学术讨论会，回国后撰写长文向日本学者介绍中国齐文化研究现状，进一步促进了中日学者齐文化研究成果的交流，这对于齐文化研究无疑是一大推动。

和《管子》比较起来，《孙子兵法》在世界上的影响要广泛深远得多。《孙子兵法》不仅属于中国，它已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因此，学习、研究、弘扬这一优秀文化遗产，已经被世界研究军事、政治、经济、思想各学科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重任。从它传播到国外开始，已经超出了纯学术研究本身，而被广泛地运用到各个领域的实践。据不完全统计，

《孙子兵法》现在已经被译成日、法、英、德、俄、意、捷、罗、朝、越、缅、泰、马来西亚、希腊、丹麦、希伯莱、阿拉伯、西班牙等 27 种文字。英国的蒙哥马利 (B·L·Montgomery) 元帅在 60 年代初访问我国时曾说过：“世界上所有的军事院校都应该把《孙子兵法》列为必修课程。”据有些报刊介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官以上的军官，人人都有一本《孙子兵法》。美国知名学者柯林斯认为：“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他的大部分观点在当前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

《孙子兵法》最先传到日本是在奈良时代 (710—784)。吉备真备 (693—775) 曾于公元 717 年留学唐朝攻读经史诸学，18 年后 (735)，他带着《孙子兵法》、《诸葛亮八阵》等中国古代典籍返回日本。据《续日本纪》卷二十二记载，淳仁天皇 (733—765 年在位) 时，于公元 760 年，“遣授力舍人春日部三关、中卫舍人土师宿弥关成等 6 人，赴大宰府就大貳吉备真备令习诸葛亮八阵和孙武的九地及结营向背”。公元 764 年 9 月，吉备真备运用《孙子兵法》的《九地》篇阐述的作战思想和作战原则，在平息当朝叛将惠美押胜的叛乱中一举成功，从而首开了日本运用《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先例。这是《孙子兵法》在日本古代作战中有文字可考的第一次成功的运用。吉备真备也因此由著名的学者、文臣之列而步入军事思想家和战将之林。不过，在这个时候的《孙子兵法》系朝廷秘藏，一般人是见不到的。

《孙子兵法》有无可能在吉备真备之前直接或间接、部分或全部传入日本呢？1963 年西方学者塞缪尔·格里菲斯考证：《日本纪》第十七册记载的材料说明，公元 516 年，即日本继体天皇 (450—531) 在位时，曾有一位熟悉武经的中国学者到达日本。公元 527 年，继体天皇在他颁布讨伐叛军的诏令中，写有这样的

话：“良将之军也，施恩推惠，怨己知人，攻如河决，战如风发”；“大将，民之司命，社稷存亡，于是乎在。”其语言显系受《孙子兵法》的影响。公元654年，日本又派大批人员至唐朝居留了5个月，带回大量书籍，因此，有可能在吉备真备之前两个世纪，《孙子兵法》就为日本人所知。当然，这个推测还有待进一步证实。《孙子兵法》传入日本之后，孙武即被尊为“武圣人”，《孙子兵法》也被推为“兵学圣典”、“世界第一兵家名书”。

公元10世纪以后，在日本学者和武将中兴起研读中国兵书之风，尤以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为最烈。著名学者大江匡房（1041—1111）利用祖上世代保管朝廷所藏中国兵书之便，钻研中国兵法，成为兵法大家。他写的《斗战经》，在日本被称为日本历史上首部军事理论著作，也是第一部研究孙武军事思想之作。这部著作受《孙子兵法》影响而又不唯孙武。大江匡房认为，《孙子兵法》出于中国而非日本，不能机械地照搬，“汉文有诡譎，倭教说真锐”。他认为“孙子十三篇，不免一个‘惧’字也”，也就是说孙武思想中的“五事七计，奇正虚实”，实际上产生于对强敌的畏惧，不是用兵正道，真锐之气才是日本国风。《斗战经》将日本的尚武精神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它一直被日本学者誉为将中国古代兵法与日本军事熔于一炉的不朽之作。

1660年，《孙子兵法》第一个日文译本问世并广为流传，不仅日本军界及其他各界对《孙子兵法》有浓厚兴趣，就连日本天皇也对其十分垂爱。他令海军中将左藤太郎给他讲《孙子兵法》，为此，左藤专门撰写了一本《孙子御讲录》作为教材。《孙子兵法》在日本军界已经从研究进入具体运用。平安朝的八幡太郎在著名的陆奥战役中发现雁鸟乱飞，当即运用兵法中“鸟起者，伏也”的原则，当机立断改变计划，化险为夷。日俄战争中，联合

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在日本海大战中，运用《孙子兵法》的“以逸待劳”的作战原则，布阵并指挥作战，全歼俄国太平洋第二舰队。

到本世纪 70 年代初，日本研究孙子兵法的论文可谓汗牛充栋，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查找资料之便，日本东北大学中国哲学研究所编撰了《孙子索引》。80 年代初，服部千春参考了历代研究《孙子兵法》的著述，重新校订，出版了《孙子兵法新校》，这是日本第一部权威校订本。需要注意的是，自 70 年代以来，日本已经把《孙子兵法》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和商业经营活动中去，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日本人自豪地认为，在经济领域运用《孙子兵法》方面所取得的成效，他们远远超过了中国人。

在亚洲其他各国的译本中，引起世人注目的是 1986 年马来西亚出版的叶新田（笔名雅辛·塔尼）翻译的马来文本。由于译者精通汉语，所以对原文和历代注释的理解都比较准确，译文简明、流畅。此书卷首有出版者的话，乌斯曼·阿旺、唐恩德和叶新田本人所写的序言。这三篇序言从不同角度对《孙子兵法》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他们认为：《孙子兵法》是古往今来中国文化宝库中最著名的经典著作之一，是对战略战术全面深刻的研究的结晶，也是一部非常有使用价值的哲学著作。

《孙子兵法》西传以法国最早。公元 1772 年，法国神父约瑟夫·J·阿米欧（J·J·M·AMIOT）在巴黎翻译出版的《中国军事艺书》丛书之一即是《孙子十三篇》。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在法国流传的《孙子兵法》一直是这个译本。据传说，这本小册子是拿破仑克敌制胜的法宝。

在西方世界里，英国对《孙子兵法》的研究深度，和美国在军事上的应用，都引起世人的注目。1905 年，在日本学习语言